

研究論文

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湘西村級微信群 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過程研究

向青平

摘要

本文運用網絡民族誌、深度訪談等方法對湘西為民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基於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微信群構建了「社會化社區」，也是作為跨科層制的虛擬治理場景。通過微信群，村民的治理參與日常生活化。互聯網將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融為一體，日常生活轉向非日常生活。國家通過在微信群滲透到鄉村社會，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鄉村社會形成「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鄉村社會治理從「體制性遲鈍」轉向「體制性敏感」。在扁平化的信息流動結構中，代理人權力受到制約。本文提出「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概念，其形成的是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機制。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模式是透視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的主要脈絡。本研究有助於回應中國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化，也有助於反思數位化時代的國家與

向青平，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傳播學博士
研究生。研究興趣：傳播與中國鄉村秩序、政治傳播、政治社會學、中國新聞
業、傳媒經濟。電郵：646427257@qq.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1年9月14日。論文接受日期：2022年6月3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鄉村社會關係。基於田野經驗材料，本研究提出「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或促進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理論的建構。

關鍵詞：鄉村治理、國家—社會、科層制、日常生活、公共領域

Research Article

Relationship, Situation, and Governance Reform: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ountryside Society in a Village-Level WeChat Group in Western Hunan

Qingping X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network ethnograph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among members of the “*Weimin*” WeChat group from Western Hun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the WeChat group has built a “socialized community” that is also a virtual governance scenario across bureaucracies. Through such WeChat groups, villagers can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Internet integrates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and spontaneously, daily life becomes non-daily life. The country permeates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WeChat group, and the 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tat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rural society has formed a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xpression-response-communication,”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has changed from being “institutionally insensitive” to “institutionally sensitive.” In a flat information flow structure, the power of the agent is restricte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Qingping XIANG (Lecture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and the rural order in Chin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sociology, journalism in China, Chinese media economic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concept of an “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 which is an authority-biased hybri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is the main vehicle for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This study responds to changes in the mode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help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eld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n “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state-society, bureaucracy, everyday life, public spher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ng, Q. (2023). Relationship, situation, and governance reform: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ountryside society in a village-level WeChat group in western Huna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4, 161–205.

致謝

本文發表之前已於第四屆中國政治傳播研究學術論壇、2021年新聞史學會博士生論壇宣讀。本文感謝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大地傳媒工作坊」的資助。

前言

湘西是我生命歷程的起點。在我前期調研及生活體驗中，我深感鄉村社會治理中溝通不暢、小事也很容易引發大矛盾的治理困境。扶貧的過程是資源流動及社會治理結構轉變的過程。自201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稱「湘西州」）要求在行政村（區）建立「湘西為民群」，建立了基層行政人員和村民共同參與的村級微信群。據《人民日報》報導：「2018年1至7月，湘西州紀檢監察機關共受理的信訪舉報與去年同期比較下降了34.4%，重複信訪舉報同比下降31.6%，鄉村職級信訪舉報同比下降26.8%」（顏珂，2018）。近年來，河南省封丘縣、重慶秀山縣海洋鄉等地也紛紛建立了類似微信群。國家權力及其意識形態下沉的過程往往需要與鄉村社會進行溝通互動。「湘西為民群」讓我深思：在數位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如何改變鄉村權力秩序？

從關於數位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研究來看，較多研究習慣於從國家如何控制、管理鄉村社會研究基層社會治理，缺少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的理論視角；而在研究方法上，諸多研究傾向於在宏觀層面探討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缺少基於田野材料的微觀視角研究。近年來中國政治學界湧現出田野政治學派，如華中鄉土學派房寧、徐勇等學者提出要扎根中國大地、基於經驗材料構建中國政治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是中國治理研究的重要議題。湘西村級微信群融合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二元治理主體，是觀察互聯網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的窗口。作為求學在外的湘西學子，我不斷地往返於田野與理論之間。由此我萌發出研究湘西村級微信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及其所產生的治理變革。在田野材料基礎上，我試圖構建數位化時代中國鄉村社會的治理理論。

鄉村治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溝通互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意義上的治理理論研究興起。政治學研究中，「治理」指的並非是國家對社會進行控制與管理，而是多元主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間的持續互動過程，尤其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結構及其變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治理」，並將國家與社會關係互動作為治理研究的核心理論。俞可平(2000)認為「善治」是社會治理的永恆目標，善治的本質是官民共治。周雪光(2017)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中提出，除了中央與地方關係外，中國國家治理分析的向度還包括國家與民眾的關係。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動，郭風英(2013)提出「無主地模式」、「國家控制社會模式」、「社會參與模式」等不同治理模式。善治(good governance)是公眾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實現善治的關鍵問題是形成國家與社會良好的合作關係(人民論壇，2014：191；郭亮，2013)，追求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¹。善治建立在協同理論上，協同理論試圖將國家與社會、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結合起來，以促進「強國家—強社會」的形成。

Oi(1989)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中指出，其並不過於關注國家與社會間力量的消長，而是更樂於討論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更能體現治理變革及社會秩序的變化。信息上的持續互動機制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重要組成(唐士其，1998)。法國學者Smouts(1998)認為「善治」由四個要素構成，其中之一便是國家與社會的信息溝通與交流。政治溝通是政治體系在輸入輸出過程中政治信息的交流和交換(王浦劬，2005)。從信息溝通互動的角度去研究國家與社會互動其實也是政治溝通。政治溝通被阿爾蒙德和鮑威爾(Almond & Powell, 2007)稱為「政府的血脈」(the blood of the government)，也被Deutsch(1963)稱為「政府的神經」(the nerves of government)。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是透視中國鄉村社會治理變革的理論視角。這既包括政府向民眾自上而下、也包括民眾向政府自下而上的信息傳播過程。

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模式引發的治理變革

政治的歷史必然在相當程度上是一部溝通的歷史(黑格、哈羅普〔Hague & Harrop〕，2007)。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模式的變化是考

察中國鄉村治理變革的脈絡。秦暉(2003: 2)將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模式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傳統社會,帝國「皇權」止於縣政,鄉村社會的主要組織方式為宗族。杜贊奇(Duara, 2003, p.16)提出「權力文化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傳統社會的「文化網絡不僅溝通了鄉村居民與外界的聯繫,而且成為封建國家的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渠道」。Siu(1989)在《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鄉村革命的協從》(*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中認為,傳統社會中,國家通過鄉紳將權力延伸到鄉村,鄉紳作為精英成了國家與社會的溝通仲介。在自上而下的溝通中,鄉紳可以制約皇權下伸;而在自下而上的溝通中,鄉紳也可以盤剝鄉村社會以獲利,成為「贏利型經紀」(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傳統社會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僅發生在村民每年交皇糧之際,鄉村社會猶如一盤散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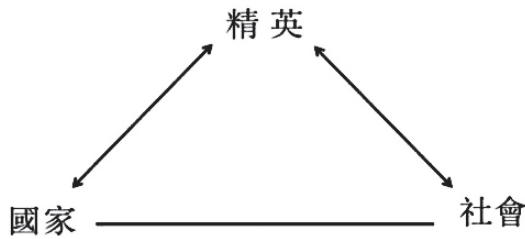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與社會一體化,人民公社體制將村落社區嵌入到國家政權中,這破壞了村莊原有的內生型社會治理網絡。改革開放後,人民公社解體,村級組織則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戴利朝, 2011: 97)。為釋放社會活力,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簡政放權讓利」的行政分權政策。1980年後,廣西宜州市合寨村村委會的自治模式在全國推廣,此後中國建立健全了鄉村社會自治制度。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路徑為:鄉鎮和村委會成為國家在鄉村的代理人,成為國家與鄉村社會銜接的橋樑、紐帶,發揮了溝通仲介(mediation)的作用。作為代理人,鄉鎮及村幹部既要負責信息的編碼(coding)將村民的需求向上、對外回饋,也要轉碼(transcoding)向下、對村民傳播國家政策。2006年,農業稅取消的治理意義大於經濟意義。農業稅時期,自下而上的資源輸送過程中出現代理人操作不規範、劫取資源等問題(賀雪峰, 2011)。

農業稅後,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整合,代理人與村民的矛盾得到緩解。但農業稅後,國家資源輸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卻又出現公共資源被代理人攔截的現象。孫立平(1993)以「國家—精英—社會」模式探討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治理結構,如圖一所示。「精英」往往成為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仲介。黃宗智(2003)在〈中國革命中的農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階級鬥爭〉中提出了四個維度來表述國家與鄉村社會間互動關聯相互作用的複雜多重關係。他認為其中「表達性建構」對於形成農民與國家間新的聯繫紐帶具有重要涵義。鄉村社會官民溝通渠道的不完善可能引發國家政策落實不到位、地方勢力腐敗，以及村民治理參與度低等諸多治理問題，進而可能出現鄉村社會治理的「內卷化」(賀雪峰，2011)。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交流使政治系統的運作更為有效(祝基濤，1987)。鄉村社會是政治系統的神經末梢，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信息溝通互動關係到中國政治系統的運作效度。

圖一 傳統鄉村社會「國家—精英—社會」治理模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推進政治溝通的現代化也是在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俞可平，2015)。在互聯網時代，傳播秩序從金字塔式的大眾傳播轉變為新聞、信息和對話的多層流動。陳衛星在《普通媒介學教程》(*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序言部分認為，傳播製造權力來自於組織能力、信息內容及信息分享對權力的製造(德布雷[Debray]，2014：16)。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邊界及互動路徑等均可能因為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而發生變化。鄭永年(Zheng, 2014, p. 168)在《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中提出，互聯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推動政治變革取決於國家和社會力量在機會結構中的互動。國家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理論視角既是重新深入認識傳統中國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更是過去被忽略的一個突破口(趙世瑜、鄧慶平，2001)。但當下關於互聯網時代鄉村治理的研究較多集中於國家或鄉村社會的單一一方面，如國家如何控制管理社會或者村民的集體行動如何形成，缺乏國

家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理論視角，很難形成較為深刻的問題意識。湘西村級微信群是觀察數字化時代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互動的窗口。基於以上文獻探討，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為：

研究問題一：國家與鄉村社會共同參與的微信群形成了甚麼樣的溝通場景？

研究問題二：微信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如何溝通互動？信息流動的變化如何影響鄉村社會治理變革？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A村為民群」

本文選取湘西深度扶貧村A村為研究對象。A村共有238戶、1,078人，其中外出務工人數約為700人，佔總人數的65%²。按照湘西州紀委的要求，扶貧資源、村務等均須在微信群中公開。行政人員必須當天回覆村民在微信群中的信息。如若長期未回覆，要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分。例如有縣級政府明文規定：凡一周內三天以上群內未公示內容，或群內村民反映困難和問題卻始終無人在群內回應，將作為年終考核扣分依據³。2011年，我在湘西州的調研結果顯示：手機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其上網功能並不為村民接受（向青平，2012）。近十年過去，實地調研發現：除了65歲以上老人外，A村村民普遍使用手機上網，並安裝了社交媒體及短視頻軟體。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具有複雜性、特殊性和條件性（鄧正來、景躍進，1992），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應在具體研究中確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委會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之際為行政人員。另外，隨著「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政策的推進，湘西州村幹部也已脫產。因此本文將村主任、村黨支部書記（村支書）列為行政人員。按照湘西州紀委的要求，被要求進入村群的有鄉鎮駐村幹部、鄉鎮紀檢幹部、村幹部及輔警等。但在具體治理實踐中，為方便溝通，其他部門的行政人員也紛紛加入微信群⁴。自2017年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湘西為民群」先後經過三次更名，分別為：村權監督微信群、監督服務微信群、為民服務微信群⁵。命名的變化也反映其功能的轉變。微信群中的行政人員必須實名備註職務和姓名。「A村為民群」中的行政人員如表一所示。

表一 「A村為民群」中的行政人員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人員	州紀檢	鎮長	副鎮長	鎮紀委	鎮綜治專幹	鎮組織幹事	駐村幹部	村幹部	村綜治專幹	支援工作隊	村計生專幹	大學生村官	網信湘西	村輔警	總計
數量	2	1	1	4	1	1	3	3	1	3	1	1	1	1	24

(整理時間：2020年11月20日)⁶

研究方法

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研究更多體現在微觀行動者的互動中(張靜, 1998; 孫立平, 2000)。福柯(Foucault, 2021, pp. 127–142)認為, 微觀權力比宏觀權力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也「更複雜、更稠密、更具有滲透性」。孫立平(2002)認為通過「過程—事件」更能把握社會本質, 這其實也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社會學。民族誌是深入官方宏觀表面敘述之下的方法(Lewis, 2011)。政治學研究中, 田野研究可以避免鏡像思維(mirror imaging), 通過辨識「前台」(onstage)、「後台」(offstage), 尋找社會細節、全面觀察分析(房寧, 2021)。網絡民族誌(network ethnography)是一種微觀視角, 其研究對象為網絡虛擬空間中的群體或個人(Hine, 2000)。該研究方法「啟發研究者從更為寬闊和有持續回饋的語境中去重新審視自己的觀感、探究和發現」(趙旭東, 2017: 6)。近年來, 網絡社區的參與式觀察方法為社會學及傳播學運用(孫信茹、王東林, 2019; 張媛、文霄, 2018)。本文採用網絡民族誌作為主要研究方法, 並輔以訪談, 這也是政治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研究階段

第一，本文的觀察時間為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29日，我從不發佈任何信息，觀察總時間為一年零一個月。之所以延長一個多月，是因為2020年年底A村村「兩委」⁷換屆。進群前，我獲得了A村駐村幹部的同意。按照「每戶一人」的入群規定，「A村為民群」應有238人，但實際也會出現每戶多人共同進入「A村為民群」的情況。調研初，除行政人員外，「A村為民群」共有群成員241名。調研結束之際，該群總人數為291人。我對州紀檢、村幹部以及駐村幹部等諸多行政人員發佈的信息進行了統計，共計1,594條⁸，主要包括網絡鏈接、圖片以及文字訊息三種傳播形式。按照研究計劃，我計劃每天以草稿的方式記錄。但很快發現微信群中的消息不多，後來改為每週週末記錄。記錄的主要內容為：發言主體、內容以及雙方的互動溝通內容。研究員重點記錄在微信群中發言的村民，然後與駐村幹部諮詢該村民的具體信息以確定是否將其列為訪談對象。

第二，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確定訪談對象⁹。從諸多研究來看，中國村民的治理參與往往與其年齡(高旺，2004)、學歷(葉媛秀、古小明，2009)以及自身利益(苑鵬、白描，2013)具有強相關性。享受過扶貧政策的村民可能與行政人員有更良性的互動；而文化程度更高的青年農民治理參與的積極性則可能更強。結合村民在微信群中的發言，本文最終確定了20名村民進行訪談，其中4位在微信群中的發言較多，其他16名則基本處於「潛水」狀態。20名村民結構比例如表二所示，村民的具體信息見附錄。針對在微信群中發言較多的村民，我會就其在微信群中提出的治理問題進行深度訪談。而針對在微信群中沉默的村民，我會就日常生活的溝通、微信群建立等問題對其訪談。另外，為充分了解村民與行政人員的溝通互動邏輯，本文也訪談了4位行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分別為：村支書YX；駐村幹部PQS，為碩士研究生，2018考入選調系統；鄉鎮幹部SX；鎮紀委幹部PH，為碩士研究生，2017年進入公務員系統工作。這可以更深度地理解雙方溝通互動的深層邏輯及溝通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表二 A村村民訪談人員人數及結構比例

類型	人數	比例
享受過扶貧政策村民	8	40%
未享受過扶貧政策村民	12	60%
40歲以下	6	30%
40歲及以上	14	70%
高中以下	18	90%
高中及高中以上	2	10%
總數	20	100%

第三，補充材料及效度檢驗。A村行政人員迴避了我的諸多問題，這為深化研究及檢驗研究效度帶來了困難。2021年2月到4月，我集中與以下行政人員進行了訪談：

1. 湘西州某機關科員LY。LY原為基層選調生，後在Y縣某部門工作四年，再通過遴選進入湘西州委某部單位；
2. X縣F鎮黨委書記XY。XY自2015年開始擔任X縣核心鄉鎮一把手，但在2020年疫情階段調離核心鄉鎮，現於其他鄉鎮擔任黨委書記；
3. X縣D鎮T村駐村幹部TKX。TKX於2017年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鄉鎮工作，在T村駐村。
4. 通過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了X縣D鎮T村的村支書PW。2020年12月，我參與觀察了T村村兩委換屆過程；
5. X縣D鎮J村村主任PQ，J村自2013年以來無一例信訪。PQ 1993年至2003年在村中擔任會計，2003年至2020年任村主任一職，2020年因年齡原因退休。

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

作為「社會化社區」

1887年，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社區」、「社會」的概念。這被

認為是深刻描述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的學術理論。滕尼斯認為「社區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實的形式。與社區相對應，社會是短暫的、表面化的社區。社區應被理解為一種活生生的有機體，而社會是一種機械的聚合，是一種人造物」（轉引自周曉虹，2002：293）。滕尼斯的「社區」是自然有機體，「社會」是人為的理性組織。在此理論基礎上，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 (Durkheim, 2013, pp. 33-73) 提出「有機團結」(social solidarity) 與「機械團結」(mechanical solidarity)，中國學者費孝通 (2005：68-76) 提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

費孝通 (2005) 在《鄉土中國》中所呈現的是中國基於血緣關係的差序格局。這其實是前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組織形式。「A村為民群」是網絡虛擬空間中基於地緣、血緣的共同體。「A村為民群」不僅是自然有機體的存在，其由國家行政力量主導建立，州、縣、鎮、村等多層行政力量均進入微信群，其行使的是與主權 (sovereignty) 相聯繫的權力。「A村為民群」兼具「社區」和「社會」兩種屬性，是一種社區社會化的現象 (夏學鑾，2001)，本文將此類組織稱為「社會化社區」(socialized community)。

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

「A村為民群」打破了科層制的垂直化溝通模式，是跨科層的虛擬社會治理場景。受制於實體關係影響，「A村為民群」所打通的是州以下的科層。社會組織的變化在於技術與組織的互動 (張燕、邱澤奇，2009)。「A村為民群」之所以形成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主要來自於這兩方面：

一方面，行政發包制下的治理效率追求。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往往以運動式的形式實現，這其中往往伴隨著高度動員的官僚組織機制 (周雪光，2012)。精準扶貧工作的展開結合了運動式治理和常規的官僚機制 (歐陽靜，2014)。隨著「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推進，社會治理資源也下沉到了基層。科層制內部「條塊」界限被打破，州級以下各個部門的行政力量投入到鄉村社會治理中，形成了州級以下行政人員與村民對接、對話及共同溝通治理的格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下的場景重組。尼葛洛龐蒂(Negroponte, 1997, p. 101)認為：「網絡的真正價值正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互聯網正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結構」。互聯網技術被應用於社區治理的場景再造。微信群打破了空間對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的身體阻礙，將多層級行政人員和村民置於虛擬空間中，形成了跨科層的虛擬治理場景。代理人作為國家與鄉村社會仲介的垂直溝通模式被衝擊，鄉村社會治理結構由科層制的縱向結構轉向了縱橫交錯的扁平化結構。

日常生活轉向非日常生活

「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表達

過去村民與代理人面對面(face-to-face)溝通，其中混雜著人情因素且需要親身在場。一方面，村民治理參與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低。村民XYM勤奮、聰明，在縣城靠做小本生意養活全家。她個人認為扶貧名單裡有「好吃懶做的人」、「違法進監獄的家庭」。她不滿地向我傾訴道：「我也沒有親戚在村裡當官。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下面的人搞壞了。我能怎麼辦，只能算了，怎麼可能公平嘛」¹⁰。村民XYM認為與村幹部的關係是決定其是否獲得扶貧資源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A村也出現了打工潮、進城熱。按照村支書YX的表述：「幾乎只有老人家在村莊，能走的都走了」¹¹。即便在外務工的村民想關心村務，但親身不在場也很難參與鄉村社會治理。村莊的空心化(rural hollowing)也使得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缺失。

表達是良性溝通互動的前提。Aristotle (1962, p. 28)在《政治學》(*The Politics*)中寫到：「自然界使人區別於動物之處就在於人類能夠理智表達」。他認為表達使人類得以交流自己的判斷，表達是人溝通的前提。村民在微信群中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表達其實也在參與社會治理。微信群中，村民的表達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行政人員發佈信息後，村民就相關信息諮詢。這主要包括社會保險、新冠疫苗、村務以及惠農政策等方方面面；二是，村民主動提出訴求、反映

自身需求，如關於扶貧資源、村務工作以及自身訴求等等；三是，地方性新聞信息的傳播，如火災、暴雨天氣、路面坍塌等相關突發事件。這其中不乏村民轉發的謠言、流言等，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本地地區的感染病例、病毒的地域分佈情況等；四是，村民以圖片、短視頻形式分享其日常生活；五是商業廣告的發佈，如關於招工、商品促銷等。儘管微信群禁止發佈此類的信息，但仍有村民發佈廣告信息。

新媒體帶來的最主要變化之一是將政治日常化(常江、徐帥，2018)。村民「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表達其實也集體無意識地參與了鄉村社會治理。日常生活與一切活動有著深層次的聯繫(王曉東，2005：38-39)。村民在微信群中的日常生活表達蘊含著其態度、意見及傾向等。從微信群中的村民表達來看，村莊其實也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治理理念，如城市景觀的拍攝、村民公共政策的關心以及鄉風鄉俗等觀念。這主要原因是「A村為民群」將真人不在場的村民連繫起來，外出務工的村民也會分享其在都市工廠中的生活和工作，這其中蘊含著現代化的個人權利意識。與諸多認為村民治理參與冷漠的研究不同的是(張勁松、駱勇，2006；趙晉泰，2007)：我發現村民其實也在關心鄉村公共事務。在自來水、危房改造以及村路等問題上，村民也要「講句公道話」。如村民XC曾發表「垃圾場都成小孩子的遊樂場了，鐵門還是要上鎖」¹²。村民WS在微信群中提醒著村幹部：「村中的老房子要塌了，人都怕從下面走，領導們是不是該解決問題了，不要等出事了才解決」¹³。

非日常生活的治理轉向

湘西州地處武陵源山區，每一個村莊幾乎都是大山阻隔的封閉空間。現代化是不斷改變日常生活的過程。日常生活的演化一般可以分為原始日常生活、傳統日常生活以及現代日常生活。原始社會日常生活覆蓋在一切存在的領域；在農業文明時代，過分強大的日常生活結構存在，其日常生活的惰性和保守性阻礙著社會變革；現代化工業文明條件下，過分發達的非日常生活和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的日常生活世界存在(吳寧，2007)。湘西封閉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具有極強的自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性、保守性和惰性。日常生活的治理脈絡構成該地鄉村社會治理的主要結構，村莊中仍然保留了血緣宗法、鄉規民約以及人情關係等，這約束著鄉村社會治理行動者的行為。

進入A村前，我從未想過會在抖音上刷到A村村民拍攝剪輯的短視頻。村民往往通過視覺化的短視頻記錄和分享個體生命中的日常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視覺呈現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視覺展現，其本質是對自身主體性、存在的尋求和確認。但村民的網絡日常生活記錄也可能會引發全國輿論。如2019年11月湘西某女教師關於日常生活的記錄在網絡流傳後，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諸多主流媒體對扶貧中的形式主義及官僚主義進行報導。近年來，鄉村社會違背現代治理理念的習俗、行為等可能形成全國性的網絡輿情，如山東殘障女子方某洋家暴事件等等。互聯網將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融為一體，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可能會擺脫了屬地約束，地方性事務溢出本地空間範圍。

中國現代化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破過分強大的日常生活交往模式，發展薄弱理性和法制化的非日常生活交往(吳寧，2007)。非日常生活是一種公共的、理性的社會交往方式。近年來，X縣的諸多治理問題被魔幻般地置於前台，成為全國範圍內的公共討論問題。網絡輿論的爆發具有不確定性、未知性及意外性特徵。X縣多次被中央級媒體點名，其原因在於村民日常生活的網絡記錄，如過去被遮蔽的交通事故又忽然形成網絡輿論。X縣F鎮黨委書記XY感受到了輿論隨時可能爆發的「焦慮」¹⁴。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現代化理論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模式變項理論」(pattern variables)均認為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不斷理性化的過程。傳統社會以情感、傳統及習慣為基礎的行為要讓位於理性行為(丁學良，1998)。封閉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和惰性。網絡輿論勢能下，日常生活成為非日常生活的輿情事件，日常生活中落後的鄉村治理問題在公共空間被理性討論。這倒逼著基層社會治理制度結構的變化，培養了村民現代公共理性思維。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自發、落後秩序轉向理性層面。

村莊的信息流動與治理變革

2020年T村村兩委的選舉引發了選舉謠言。

2020年12月¹⁵，屋外寒風嗖嗖，Y村6位村民圍坐火塘¹⁶。一位村民的到來為火塘邊的村民帶來了飯後談資：「你們曉不曉得，T村選舉沒搞好，縣裡都派人來查了」，其他村民也將他們道聽途說的情況你一言我一語地進行分享。

村民們紛紛相傳，T村村民只在投票單上寫自己親戚的名字，原因在於村民認為村幹部只給親戚扶貧資源。T村出現了選票不集中，甚至有幾十位候選人的情況。但實際情況卻是：2018年C村與D村合併為T村。P氏和X氏家族為C村的兩大家族。相傳P氏和X氏同祖同血脈。選舉過程中，C村合力選舉年輕大學生TS為村主任。C村村民算來算去，認為TS的票數最多，應該當選。但實際情況卻是，TS並不具備村主任的當選條件。儘管駐村幹部多次解釋TS無法當選原因，但P氏和X氏家族仍將其質疑向周邊村莊傳播。在村民添油加醋中，鄉村輿論逐漸形成各種各樣的謠言。事實上，縣裡也並沒有調查T村的選舉。

為避免正面衝突，但又希望官方知曉其主張，村民往往以「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作為其表達方式。「隱藏的文本」用以說明發生在後台(offstage)的話語，它避開掌權者的直接監視，通過掩蓋痕跡使傳播者的危險減至最小，是一種具有底層邏輯的表達(郭於華，2002)。在村民看來，熟人社會(acquaintance society)公開表達的可能代價是扶貧資源的喪失。謠言作為一種「隱藏的文本」如同平靜水面下的潛流。儘管事實可能存在偏差，但村莊中廣泛傳播的謠言卻蘊含著村民真實的情感態度。T村選舉反映了鄉村社會治理的問題在於：上下溝通不暢而導致鄉村社會治理問題。政府的理性制度進入鄉村社會治理場域，往往需要深度嵌入鄉村社會的內生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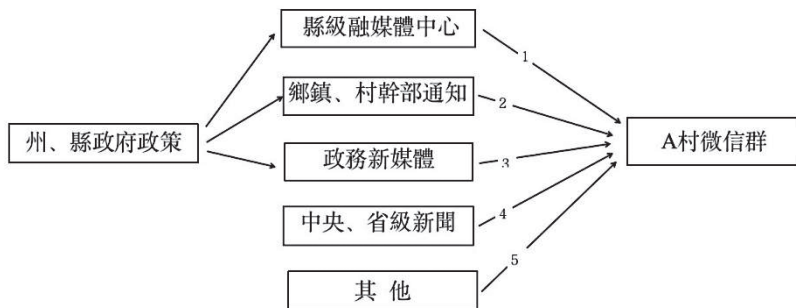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國家嵌入鄉村社會日常生活

I. 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

微信群未建立前，村幹部往往以紙質海報、橫幅以及宣傳牆等方式進行政策傳播，村民之間則通過口耳相傳，傳播規模小、信息易流變且傳播主體受限於身體是否在場。「A村為民群」中，自上而下的信息傳播路徑如圖二所示。州、縣政府的政務信息為縣級融媒體中心、政務新媒體解讀且傳播。X縣政府部門上午開會，縣級融媒體中心及縣級政務新媒體就能在當天晚上將會議內容製作成新聞，鄉鎮駐村幹部再將信息轉發至村級微信群。另外，村幹部、鄉鎮駐村幹部往往以圖片、文字的形式轉發到微信群。這其實擴大了行政人員與村民對話的規模性，提高了信息傳播的確定性。即便村民身體不在場，也能及時了解村莊中的信息、參與村莊治理。從「A村為民群」行政人員發佈的信息來看，信息發佈的內容包括中央、省級新聞，縣級行政部門政務信息以及村務等等，涉及對農政策、村務活動以及農業生產等方方面面。

圖二 「A村為民群」自上而下信息傳播路徑



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科層制」(bureaucracy)。中國形成了以等級有序的科層制組織來進行國家治理的傳統(周雪光，2011)，五級政府的設置(中央、省、地級市、縣、鄉)使得自上而下信息量的損失和信息失真的概率加大(周天勇，2008)。在上而下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對農政策內容傳達至縣域政府及幹部後很容易「懸浮」。代理人作為溝通仲介的鄉村治理模式往往產生代理人的信息特權。村

中事務不公開或有選擇性的公開往往會滋生村幹部的腐敗。另外，代理人的政策闡釋水準不一致，政策信息往往也會出現扭曲、失真等問題。2018年，「湘西為民群」設計者、湘西州委原紀委書記鄧為民認為：村莊腐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村權運行不規範，村務公開不真實、不全面、不透明，流於形式，監督乏力等是主因」（轉引自顏珂，2018）。相對於垂直化的科層制信息傳播路徑，村級微信群實際減弱了代理人轉碼過程中的信息扭曲、遺漏及隱瞞等。

傳統社會中，處於官制系統之外的地方權威卻實際控制著地方區域的內部事務，帝國的意志經過各級仲介層層變通，往往不能真正觸及地方（張靜，2000）。封建社會中的國家治理，儘管高度集權，但基層滲透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薄弱。麥克盧漢（McLuhan, 2000）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微信群將原子化的村民聚集在網絡空間中，國家權力延伸到了鄉村社會的神經末梢，媒介亦是國家的延伸。通過微信群，國家接觸到最邊遠的村莊中，連接了原子化的個體，從而實現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連接。正如湘西州某機關科員LY所說：「我們雖然人在吉首¹⁷，但我能在微信群裡看到村民、接觸到村民」¹⁸。微信群成為國家滲透鄉村社會的基礎設施，這其實提高了國家的基層滲透力。

II. 國家在日常生活中相遇鄉村社會

2020年秋，因多日連續暴雨，A村水稻無法像往年正常晾乾。A村紀檢專幹在群中發佈信息：「家裡有稻穀沒曬乾的可以去某某地烘乾，烘乾費用縣裡補貼部分」¹⁹。村民紛紛就「烘稻穀」一事進行諮詢。村民QS在群中回覆為：「急群眾所急，感謝村裡，希望有專人盡快組織村民去烘乾，我也有1,000多斤急需烘乾」²⁰。2019年，QS祖宅曾被大火燒滅。政府為其解決了暫住地、保險賠償及房屋修建等問題。過去，村民與行政人員的線下良性互動很容易轉化為村幹部與村民私人間的互動。村民QS在微信群中表達感謝後，多位村民以微信表情包等方式為行政人員點讚，微信群中國家與村民的良性互動也更公開化、制度化。

人是現實生活的凡夫俗子，村民是最貼近日常生活中的群體之一。日常生活是一種「鏡像」，權力往往會在日常生活中投射。孫立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2002: 94)認為：「我們對日常生活的強調……是將日常生活看作普通人與國家相遇和互動的舞台」。現代國家能更突出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行政權力的「彌漫」使得地方性社區從以往較為自主的區位走向全民社會行政細胞化(朱健剛，1999)。鄰里糾紛、農業種植等細微繁雜的日常生活將國家權力、基層動員以及個人訴求等相勾連，成為國家與鄉村社會相遇的舞台。國家通過日常生活嵌入到鄉村社會，促使國家權力和意志的自然化與正當化。國家的日常生活信息發佈其實也體現了國家治理意圖。如改革開放後，傳統社會道德失去約束力，法律並未在基層確定，鄉村社會失序(孫立平，2004)。為重構鄉村社會的秩序，基層行政人員在微信群中進行普法宣傳、發佈地方先進人物信息，如地方子女孝順典型案例等，試圖通過普法、重構道德彌補鄉村社會的失序。

國家必須考慮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感受以真正實現社會治理的變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鄉村社會的政治變革要和村民的日常生活感受結合起來。群眾日常生活沒有變，人們的意識、態度並沒有改變，這樣的宏觀革命是不徹底的(轉引自吳寧，2007)。國家要注重對村民日常生活的改造與改革，所要喚醒的是村民日常生活感受的改變。在「A村為民群」中，行政人員發佈住房、農業生產、醫療信息以及生產技能培訓等服務村民日常生活的信息。如面對2020年洪水天災，基層政府進行了農業生產活動的日常生活議程設置。村民們在「A村為民群」中以表情包的方式感恩政府，這其實提高了國家認同。這是一種村民自發的對生產生活的情感流露。在日常生活的服務及溝通互動中，官民形成強情感連接。微觀日常生活的良性溝通互動增強了村民對國家宏觀制度層面的認同。

德國哲學家布伯(Buber, 1986)認為，對話的本質在於對話雙方的精神「相遇」。真誠的對話溝通更多的是雙方價值觀、精神的連接。政府的網絡日常生活議題設置如若未嵌入鄉村社會的價值觀系統，極大程度地冒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識則意味著引發眾怒。如A村將養豬場修建在祖先留下的水井上，這其實是對村民日常生活常識的冒犯，遭到了村民的質疑。F鎮黨委書記XY提到：「村民提出扶貧要修路，如

果因山高陡峭等現實因素實在無法實現村民的要求，也要獲得最大多數村民的認可，並公開向村民說明。一般來講，我們也能獲得村民的理解」²¹。憑藉著對常識判斷，村民往往也能諒解行政人員的舉措。鄉村中的輿論也在修正村民的行為，村民不合理的要求往往會在鄉村中的輿論受到指責。宏觀在銜接微觀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行政人員將非日常語言轉變為日常語言。村支書往往以「各位父老鄉親」作為其發佈通知的開頭。但微信群中也有生硬晦澀的行政語言，如「堅決貫徹落實上級指示精神」²²。

從「體制性遲鈍」到「體制性敏感」

I. 體制性遲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T村駐村幹部TKX向我說起了這樣一個案例²³：

某村有一位老農民，他認為村幹部在退耕還林中有貪污的嫌疑。距離當時已過去十幾年了，但這位老農民不斷寫信要舉報基層行政人員，總涉及2,000多元人民幣。按照村幹部TKX的推測，在當時的溝通過程中可能未解釋清楚。之後無論基層幹部怎麼解釋，村民都不相信。這位村民便以更激烈的方式向上反映問題。

基層社會是引發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糾紛的源頭。「A村為民群」建立前，村民的訴求往往通過村幹部回饋到鄉鎮，再由鄉鎮傳達到縣級政府。如T村駐村幹部TKX所說：「一般而言，村民回饋到縣級政府就已經是非常大的事情」。村民反映的問題一般都是日常生活小事，但如果村幹部無視村民的「小事」，則可能出現鄉村社會越級上訪等非良性互動的治理問題。唐斯(Downs, 2006, pp. 129–130)認為：「科層制中，每個科層上的官員向上層傳遞的信息都傾向於扭曲信息的真實度，即都會誇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盡量減少或隱藏對自己有害的信息」。于建嶸(2008)認為基層社會治理中存在「體制性遲鈍」，即陷入起因都很小，但基層反應遲鈍、事件爆發輿論的基層治理怪圈。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總體性社會向複雜性社會轉向。不同利益主體需求的碰撞意味著糾紛、衝突等，基層社會治理問題因治理價值理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念的多元而逐漸複雜化。伊斯頓 (Easton, 1989, p. 110) 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中指出，「無論何時，需求大量的表現出來，以至於系統沒有能力把它們吸收下來並通過各種通道傳遞給權威當局，就必然對系統造成壓力」。基層社會如若沒有中間組織表達利益訴求，矛盾糾紛要麼沉沒、要麼很容易極端爆發 (孫立平, 2000)。在多次回饋一碰壁的單向溝通迴圈中，村民會累積無助、憤怒等負面情緒。互聯網環境中，傳播資源的社會化以及傳播權力全民化，封鎖消息很難解決基層社會的治理問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 數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國農村線民規模為 2.97 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 59.2%。基層網絡需求表達的多樣性以及其矛盾的複雜性都可能對政治系統造成壓力、形成治理風險。

II. 體制性敏感轉向：「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

2020 年 5 月 9 日晚 8 點 18 分左右，湘西州的一位村級微信群中，網名為「夢裡水鄉」的村民以短視頻形式反映「廁所改造」的品質問題 (向民貴, 2020)。此消息發佈後，其他村民則在微信群中議論紛紛，微信群中形成了憤怒的輿論氛圍。「夢裡水鄉」消息發佈一個小時後，村幹部、駐村幹部、鄉鎮幹部紛紛表示要「調查核實」。短短兩小時內，村鎮兩級行政人員回覆了村民。5 月 10 日上午，村鎮兩級行政人員便對工程專案品質進行了檢測，並將專案問題上報到縣農業局。當日縣農業局分管領導和技術人員就到場調查，最後發現專案品質問題是包工頭的問題。

費恩伯格 (Feenberg) 認為技術是非中性的社會性產物，在技術的使用和設計中其實就已滲透進了社會的價值 (轉引自朱春艷, 2006)。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科爾曼 (James Coleman)、林南 (Lin) 及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 等人紛紛提出社會資本理論 (social capital theory)。作為一種新的權力來源，互聯網為「相對無權者」(powerless) 進行賦權 (喻國明、馬慧, 2016)。「A 村為民群」拓展了村民的社會網絡，村民在微信群中的表達與其社會資本、是否真實在場的關係不大。夏瓦 (Hjarvard, 2018) 認為，微信空間治理的聊天化，所有參與者彼此處於平等地位。「A 村為民群」中，官民間的對話結構更加扁平化。群成員

至少在形式上擁有同等的談話時間、空間和機會。通過連接州以下的行政人員，微信群中村民的需求也可能會得到州級行政人員的回覆。這對於過去長期深處深山裡的村民來說是從未想像過的。

伊斯頓(1989: 109–110)將「從群體向另一個子群資訊流動的路徑稱為甬道(channel)」。政治系統中的成員以資訊的流動改變權威性的決策，因此每個政治系統都有需求網路(the flow channels of demands)。「A村為民群」為村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提供了甬道(channel)。就甬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而言，村民在微信群、網站反映的諸多問題均會被記載。甬道結構(channel structure)方面，伊斯頓(1989: 115)認為，「在一個政治系統中，結構分化程度越高，也就越能把更多種類和數量的需求輸入到系統中」。相對於自下而上零散的、分散的非正式口頭表達，「A村為民群」中村民的需求更加聚集化、規模化，身處不同地區的村民都能集中地進行需求表達。相對於分散的鄉間三五成群的議論，微信群其實能形成更有力量的鄉村輿論。只要村民發佈消息，州級以下的信息歪曲、瞞報及封鎖消息幾乎成為不可能。按照「A村為民群」的規定，即便村民反映的小事也要得到行政人員的及時回覆。跨科層的鄉村社會虛擬治理空間中，其他行政人員也能迅速有效地發現鄉村社會治理問題。這減少了村民在日常生活反饋碰壁過程中所產生的積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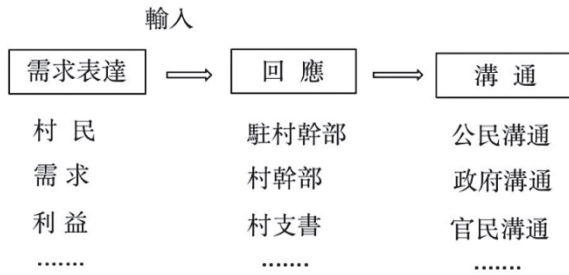
村民在網絡虛擬空間可隨時反映問題。如2019年10月19日，在「A村為民群」中，村民轉發了一則短視頻。該短視頻顯示：某縣政府辦事員態度惡劣，甚至意圖打人²⁴。該短視頻迅速在鄉村諸多其他村級微信群中傳播，形成了地方範圍內的輿論。事發當晚，政府部門便發佈聲明對該辦事員作出停職處理。近年來全國性網絡輿論的爆發頻率在減少，但地方範圍內的網絡輿論仍在不間斷地爆發。H省B市網信辦副主任ZH認為微信群的作用在於：一是，基層社會的治理問題不進一步演化為網絡輿論；二是，通過多主體協商，基層的矛盾和糾紛能在微信群內化解²⁵。相對於「體制性遲鈍」，依靠微信群發現解決基層社會治理風險的模式逐漸促使基層社會治理形成了「體制性敏感」機制。這其實是在互聯網時代，行政體制對村民網絡需求表達以及其可能引發輿論的敏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風俗習慣、鄉規民約等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約束著村民的日常生活，是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謝暉，2004；Geertz, 2000)。改革開放後，地方性共識在劇烈的變動中減弱甚至喪失了約束力(賀雪峰，2013)。但鄉村社會治理還需要考量現代理性治理因素。鄉村社會治理的複雜性在於其需要融合德治與法治多重治理理念。如三十餘年前，A村村民參與修建了小水電站，修建之初村民與基層政府達成民間口頭承諾，所有村民可以免費用電。隨著國家電網的普及，A村村民仍堅持不肯繳費。但無論是關閉總電閘，還是縣級行政人員進村勸說，均遭到了村民的抵制。基層幹部線上線下以「舉例子，講道理」的宣傳方式將村民納入理性協商層面，最後村民與基層行政人員達成了共識。在衝突情境中，網絡空間中非面對面的溝通將雙方置於理性討論層面，也能避免線下的直接衝突。中國地域廣闊，每個村莊都有其社會治理脈絡。鄉村社會治理往往需要協商以實現「在地化」(localization)治理，溝通協商所產生的交往權力有助於國家運用濡化能力(enculturation)。

「A村為民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其運行機制如圖三所示。「表達」即村民在微信群中訴求、期望、利益等需求的表達；「回應」即為基層幹部快速表態回覆。根據「糾紛金字塔」理論：低層次糾紛解決比例的減少，相應地會使高層次糾紛解決比例上升(郭星華、曲麒麟，2011)。近年來，「楓橋經驗」在全國推廣，為預防「小事變大事」，要將矛盾化解在糾紛發生的源頭。一般而言，村、鎮兩級就能解決村莊出現的大多數糾紛矛盾；「溝通」則是多元主體的對話溝通協商治理。溝通互動層面，不僅是官民溝通，還涉及村民間的溝通、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既有線上溝通，也涉及縱橫交錯結構上多行政部門的線下協同。鄉村社會治理矛盾糾紛往往瑣碎繁雜，大量糾紛矛盾通過對話溝通解決，從而降低了基層社會治理成本。

圖三 「表達—回應—溝通」治理機制



扁平溝通結構下的代理人權力約束

I. 代理人權威衰落的鄉村社會秩序

在2011年、2013年的田野調查中，我發現：A村村民與政府的信息溝通渠道單一，村民反映問題的對象主要為村幹部。村幹部如若沒有回應或者回應冷漠，村民就很難再主動關注村莊中的社會事務，社會治理參與意願較低。農業稅取消後，國家資源下鄉，但以代理人為仲介的垂直溝通系統產生了信息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往往製造信息特權，信息強勢方能利用信息優勢損害信息弱勢以獲得利益。社會資本弱的村民往往被排斥在鄉村社會的治理場域。為反映鄉村社會治理問題，村民往往通過越級信訪的方式實現利益訴求。在「不出事」的基層社會治理邏輯下，信訪模式中出現了專職信訪人員（賀雪峰、劉岳，2010）。據湘西州紀委統計，2016–2017年，在精準扶貧專項監督和腐敗問題的專項整治中，70%以上的信訪舉報反映的是村幹部存在腐敗和作風問題（顏珂，2018）。

權威是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鄉村社會有「中間人」化解糾紛的傳統。無論是傳統社會鄉紳，還是作為代理人的村幹部，都是調解鄉村矛盾糾紛的「中間人」，「中間人」往往在村莊中擁有較高權威。韋伯（Weber, 2010）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於某種特定的權威（authority）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他將權威分為魅力型、傳統型及法理型。傳統社會中，將國家與鄉村社會勾連、具有公共特質的鄉紳屬於魅力型權威，其也被韋伯稱為克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是鄉村社會的內生權威。賀雪峰（2011）認為，代理人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權威衰落、信任危機及資源分配不公進而造成村民的力量感、正義感與是非觀的喪失。糾紛形成的積怨沉澱在鄉村社會中，一旦細微的矛盾糾紛爆發，鄉村社會往往會發生惡性刑事案件。

II. 代理人的「不敢亂來」

2020年9月8日，「A村為民群」的村民積極討論自來水問題。村民諷刺：村裏自來水只有上面領導檢查的時候才有水來。其中村民SJ在微信群中質疑：「@鎮紀委副書記LYP@村支書：你們說說『兩不愁，三保障』是甚麼？」²⁶。村民SJ告訴我他通過微信群、抖音等社交媒體了解到「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標準²⁷。信息賦能村民，村民SJ以國家政策質疑基層行政人員的不作為。村民SJ為青年農民，曾為村小組組長。村民SJ曾因務工補貼冒領等與村幹部產生矛盾糾紛。微信群中，被邊緣化、被排斥在鄉村治理之外的村民也可以參與村莊的治理。SJ向我展示了其點讚的抖音短視頻，其中多條涉及國家政策、地方政策及反腐影視劇等。

減少信息歪曲的辦法是消除中間人、維持扁平的層級組織(唐斯，2006)。安東尼·吉登斯(Giddens, 1998)提出結構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社會結構與能動行動者間彼此建構。鄉村社會溝通結構的變化促使鄉村社會權力關係及其治理結構發生變化。「A村為民群」中，代理人主要受兩方面制約：一是，村民的信息發佈對代理人形成輿論監督；二是行政力量的制約。鎮紀委人員PH稱：「不止(不僅僅)是村群起作用，對村幹部起到約束作用的還有國家制度和政策」²⁸。A村村支書YX在微信群中稱：「村幹部是在群眾眼光及紀委的監督下做事，不敢亂來」²⁹。村支書「不敢亂來」的背後是鄉村社會溝通結構變化下的權力自覺。

鄉村社會中的官民對話溝通其實也增強了基層政府的公信力。縣政中，對於村民而言，國家行政人員非常神秘，似乎縣長就是最大官。村民對行政人員存在著「不作為」、「清閒」、「貪腐」的想像。無論村幹部如何解釋，部分村民總認為村幹部都是貪污腐敗的。村民SQ甚至對外聲稱，不管村主任是否合法合規，只要在精準扶貧中沒有他的名額，他就要去信訪³⁰。湘西村級微信群的新聞材料顯示，有村民在夜

間9點諮詢醫療報銷並抱怨：「『當官』的都睡著了，等『當官』的醒了再給我答覆吧」（田術雲、楊少游，2018）。但沒想到的是，基層行政人員馬上回覆了他的疑問。村民往往將其對行政人員的暗自揣測和誤解以謠言的形式進行傳播。F鎮黨委書記XY認為：「『湘西為民群』實際上是『讓群眾明白，還幹部清白』」³¹。這其實起到了維護基層行政人員權威的作用。

2020年以來，「A村為民群」雙向對話的頻率明顯下降，逐漸陷入了行政參與、村民沉默的治理困境。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現實的鏡像世界阻礙了村民的行動。Plato (1974, p. 316) 提出了知名的「洞穴理論」(allegory of the cave)。基層社會口耳相傳的線下輿論所建構的世界阻礙了村民行動。礙於人情和面子問題，村民也並沒有在微信群中表達，其真實情感態度暗流於三兩人群聚集的微公共領域中或以隱藏文本的方式流動於村莊中。即便行政人員在微信群中發佈了村權監督案例、儘管有線上信息不斷告知村民只要信息發佈就可能受到重視處理，線下輿論環境卻阻礙了村民行動，村民治理參與的自我效能感低。

第二，基層行政人員也會逃離互聯網的制約。溝通的前提需要雙方權力的對等和坦誠的態度。正如Srader (2015, p. 98) 所言：「任何說話者都面臨對著空氣自說自話的風險，或者說，就像朝空中拋一個球，而聽者接住這個球並拋了回來，從而成為一個遊戲一樣」。「A村為民群」中多元治理主體的存在意味著治理力量的權力博弈。「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行政人員其實很難一一與村民解釋國家的諸多治理政策。基層行政人員也會將反映次數過多的、反映問題激烈的村民，如「罵娘」的村民從微信群中踢出，鄉村社會的諸多治理問題仍然無法線上解決。

網絡微觀公共領域與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

採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作為理論工具難以迴避的是中國公共領域的討論。Rankin (1993) 認為在中國語境下，中國的公共領域要求國家的在場、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動的社會參與。1989年，美國政治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家達爾(Dahl, 2006)提出「微觀公共領域」(mini-populus)。此後不同學者對「微觀公共領域」進行定義，但強調的是參與規模有限的小型集會、利益相關者直接對話和協商。借用達爾的概念，本文將湘西村級微信群界定為「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online village micro-public space)。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在國家主導下、基於鄉村有機社區成立，解決了國家與有機社區的連接和溝通問題。其參與的規模範圍有限，利益相關者包括村民、也包括不同科層的行政人員。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融合了自上而下的權威性溝通以及自下而上的表達(expression)性溝通。國家主導建立的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吸納鄉村社會參與溝通治理，為鄉村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達管道，其所形成的是權威偏向的混合溝通機制。

鄉村網絡公共領域體現了鄉村社會通過正式制度溝通能力微弱的體現。國家「幫扶」或「代替」鄉村社會主導並建立了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緩解了因代理人溝通而產生的資訊的扭曲變形以及鄉村社會公共領域缺失等諸多治理問題。在媒介化社會(media society)中，國家通過技術延伸到鄉村社會中，試圖改變因技術變革可能產生的非可控的社會變革。隨著中國的現代化推進，傳統社會「權力文化網絡」的適用性在逐漸降低，鄉村社會仍應建立在「契約式溝通」上，即理性之下的溝通互動。儘管近年來中國多地為創新鄉村社會治理，試圖通過「新鄉紳」重塑鄉村社會秩序(成夢溪，2021)，但現代化治理仍然要納入更理性、正式及法治化的治理體系中，「新鄉紳」是否能在鄉村社會治理中成為持續維繫鄉村社會秩序的力量仍需考量。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中，代理人的灰色權力地帶被國家吞噬，或者說，代理人其實已經國家化。相對於代理人作為仲介的溝通治理機制，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是行政制度下更理性、村民更廣泛參與的治理模式。

溝通互動往往產生協商。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距浙江溫州民主懇談會已二十餘年，民主懇談會的本質是協商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模式。該模式中多元治理主體以面對面的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溝通協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基層治理的現代化要實現協商民主的制度化以及最廣泛的協商民主

等問題。林尚立(2016)在《論人民民主》中認為，日益完善的協商民主制度體系加上日益發達的網絡技術，無疑將為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制度提供有效的保障，從而使新型的人民民主有了切實的實現條件。互聯網為中國鄉村社會協商民主的實踐生產了空間和平台。鄉村社會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將分散的、邊緣化的村民納入到鄉村社會治理系統中。在更開放的交流環境中，實現最廣範圍、最廣泛化的鄉村社會治理參與，矛盾糾紛等在國家可控範圍內協商溝通解決。多元治理主體在不斷衝突、溝通的過程中促進鄉村社會權力秩序的動態調整。在日常生活治理實踐層面，國家與鄉村社會達成微觀治理共識。

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的互動變化意味著鄉村社會治理的變革。現代化治理的根本是要進行「國家政權建設」(state making)。按照蒂利(Tilly, 2007, p. 1)的觀點，「國家政權建設」是國家對社會的強化過程。「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合理化的、能對社會與全體民眾進行有效動員與監控的政府或政權體系(紀程，2006；于建嶸，2011)。杜贊奇(2003)認為，國家政權建設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的控制逐漸加強；二是在現代化民族國家內，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在逐步擴大。隨著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在全國的推廣和普及，國家通過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嵌入到鄉村社會毛細血管，將鄉村社會分散的、多中心的權威體系轉變為國家在鄉村社會的治理組織，鄉村社會被國家組織整合，國家在維護鄉村社會秩序上發揮重要作用。在國家主導下，鄉村社會的建設性意見調整了基層社會治理制度。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良性互動其實也完善和促進了國家政權建設。

討論與反思

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仍然存在溝通地位不平等、溝通不充分等諸多問題。鄉村社會中，強國家與弱社會間的持續溝通以國家的自主性和強制性為必要條件。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互動則以行政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前提。為推動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國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戰略，國家監察制度下鄉，基層社會治理資源下沉。單靠互聯網確實很難推動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可持續協商溝通。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不足，國家只有強力介入鄉村社會治理以推進鄉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但一旦國家強制力或自主性不足，鄉村社會又缺少內生秩序的力量，鄉村社會治理又往往會陷入失序的治理困境。國家又要再介入鄉村社會治理以改善治理亂象問題，鄉村社會形成了「依賴型溝通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往往又需要國家投入更多的社會治理資源以維繫鄉村社會秩序。數位化時代如何有序釋放鄉村社會自治力量仍然是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問題。

數位化時代，國家不知曉的、遮蔽的、要表達的，鄉村社會認同的、反對的、要揭露的都在網絡空間中呈現。互聯網已嵌入到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中，成為影響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變化的重要變數。國家與鄉村社會不僅僅是鄭永年(2014)所稱的相互構造、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從湘西微信群的研究來看，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係仍然複雜，二者顯現出了相互博弈、互動、滲透、拉鋸以及塑造等現象。當下難以下結論的是：互聯網時代，中國未來究竟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影響更大，還是鄉村社會對國家的影響更大。僅從湘西村級微信群而言，網絡空間中的互動及其影響仍以實體關係的強弱為基礎。如果國家迴避基層社會治理問題，村民治理參與的自我效能就會降低。若村民要進入鄉村網絡微觀公共領域，亦往往需要掌握數字技術、具備理性表達能力以及自我權利意識等。村民進入網絡空間並不意味著村民就在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網絡空間中的鄉村社會治理往往陷入「行政有效、治理無效」(林尚立, 2016)的困境。

研究限制

本文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是二元而不是多元的。一旦鄉村治理主體表現出多元性，「國家—社會」範式下的理論框架就會存疑。本文尚未深度探討的是代理人與基層行政人員的複雜性。另外在深度訪談上，本文很難在A村對部分基層行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我訪談了其他地區同一級別、同一職位的行政人員以完成研究。本文很難擺脫

社會科學的時間性、條件性及環境性的限制，這是社會科學的宿命，也是中國研究的複雜性和趣味性所在。

未來研究建議

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關係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未來鄉村治理研究或可從以下層面進行：一是，在互聯網時代，中國鄉村社會自發形成的網絡公共領域如何形成、其條件如何、其治理效果如何，與本文中的「網絡微觀公共領域」有何區別，其所釋放的治理效能又有何不同；二是，中國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層級的國家與社會均有其不同，本文對國家與鄉村社會進行了分解研究。未來如若出現了新的具體的普遍性研究案例，或可再探討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以拼湊出中國國家治理的宏觀理論圖景；三是，在數位化時代，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鄉村社會三者的溝通互動如何影響鄉村社會治理。未來的研究仍然需要更多的經驗材料以進行深度探討，才能形成更全面的中國鄉村治理理論。

註釋

- 1 帕累托最優理論指的是資源最優化配置的狀態。由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提出。
- 2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12月29日，A村駐村幹部PQS。1992年出生，碩士研究生畢業。
- 3 源自2020年10月，湘西W縣湘西為民群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的《關於W縣湘西為民村級監督服務微信群運行情況的通報》(月報)。
- 4 深度訪談材料，湘西州紀委宣傳部TXX。
- 5 深度訪談材料，2020年12月18日，湘西州紀委宣傳部TXX。
- 6 研究員按照微信群的實名備註進行整理。需要解釋的有：(1) 有的地方將駐村幹部(鎮)也稱為「包村幹部」；(2) 其中「支援工作隊」為幫扶單位行政人員；(3) 為加強對村莊綜合治理，2019年湘西實行一村一輔警，A村有輔警一名。輔警主要是完成縣公安局對村的工作；(4) 「網信湘西」則是湘西自治州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A村設置的網絡輿情觀察點；(5) 為促進A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村農業、扶貧，「A村為民群」也吸納了科研機構、大學等技術人員，研究員並未將其列出。
- 7 2020年12月村兩委換屆，村支書和村主任一肩挑。
 - 8 說明：本文數據統計的原則為：只要發佈就計入統計數據中。但剔除了村幹部發佈的每日村委會值班的信息。約自2020年8月規定，「湘西為民群」需要公佈村委每日值班人員的聯繫方式。
 - 9 根據訪談對象的要求，其訪談方式也不同，主要有微信語音、電話。其中僅有一封書面回覆。訪談時間最長為1小時8分鐘，最短為11分鐘。本文將訪談時間超過30分鐘的稱為「深度訪談」，訪談時間低於30分鐘的，稱為「訪談」。
 - 10 訪談材料，2020年10月8日，A村村民XYM。
 - 11 深度訪談材料，2020年10月12日，A村村支書YX。
 - 12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19年10月2日。
 - 13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11月5日。
 - 14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 15 研究員未具體備註到具體準確的田野時間。
 - 16 「火塘」是湘西的一種生活文化，白天煮飯，晚上烤火取暖，能夠容納五到八人圍坐取火。
 - 17 吉首是「吉首市」，為湘西自治州行政區首府。
 - 18 訪談材料，2020年12月6日。LY原為選調生，後在Y縣宣傳部工作四年，再通過遴選進入湘西州委某部單位。
 - 19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21日。
 - 20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21日。
 - 21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 22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6日。
 - 23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補充訪談資料)。A村駐村幹部，TKX(微信群管理人員)。1991年出生，2017年考入鄉鎮公務系統。
 - 24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19年10月19日。
 - 25 座談會，2021年4月19日，H省B市網信辦副主任ZH。大學文化水平，男，在B市網信辦工作五年，1982年出生。
 - 26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9月8日。
 - 27 「兩不愁」、「三保障」指的是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兩不愁」指的是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的是，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 28 訪談材料(文檔回覆)，2020年12月29日，鎮紀委PH。1989年出生，2017年進入公務系統工作。
- 29 A村為民群聊天記錄，2020年10月8日，A村村支書YX。
- 30 訪談材料，2020年9月8日，村民SQ。SQ1975年出生，小學未畢業。
- 31 深度訪談材料，2021年4月23日。X縣F鎮黨委書記XY。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丁學良(1998)。〈「現代化理論」的淵源和概念構架〉。《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頁65-78。
- Ding Xueliang (1998). "Xiandaihua lilun" de yuanyuan he gainian goujia. *Zhongguo shehui kexue*, 1, 65-78.
- 人民論壇(2014)。《大國治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Renmin luntan (2014). *Daguo zhili: Guojia zhili tixi he zhili nengli xiandaihua*. Beijing: Zhongguo jingji chubanshe.
- 于建嶸(2008)。〈中國的社會洩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1期，頁4-9。
- Yu Jianrong (2008). *Zhongguo de shehui xiefen shijian yu guanzhi kunjing*.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 zhuyi*, 1, 4-9.
- 于建嶸(2011)。〈國家政權建設與基層治理方式變遷〉。《文史博覽(理論)》，第1期，頁33-39。
- Yu Jianrong (2011). *Guojia zhengquan jianshe yu jiceng zhili fangshi bianqian*. *Wenshi bolan (lilun)*, 1, 33-39.
- 王浦劬(2005)。《政治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Wang Puqu (2005). *Zhengzhixue jich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王曉東(2005)。《日常交往與非日常交往》。北京：人民出版社。
- Wang Xiaodong (2005). *Richang jiaowang yu fei richang jiaowang*.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小賓厄姆·鮑威爾(2007)。《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鄭世平、公婷譯)。北京：東方出版社。(原書 Almond, G. A., & Powell, G. B.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Jiabuliaier Aermengde, Xiaobinemu Baoweier (2007). *Bijiao zhengzhixue: Tixi, guocheng he zhengce* (Cao Peilin, Zheng Shiping, Gong Ting, Trans.).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Almond, G. A., & Powell, G. B.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尼古拉·尼葛洛龐蒂(1997)。《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原書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Knopf.)
- Nigula Nigeluopangdi (1997). *Shuzihua shengcun* (Hu Yong, Fan Haiyan, Trans.). Haikou: Hain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Knopf.)
- 田衛雲、楊少游(2018年12月5日)。〈湘西為民村級微信群：搭建聯繫服務群眾的資訊化平台〉。上網日期：2021年4月1日，取自新湖南，<https://www.hunantoday.cn/article/201812/201812050930021755.html>。
- Tian Shuyun, Yang Shaoyou (2018, December 5). Xiangxi weimin cunji Weixinqun: Dajian lianxi fuwu qunzhong de zixunhua pingtai. *Xin Hunan*. Retrieved April 1, 2021, from <https://www.hunantoday.cn/article/201812/201812050930021755.html>.
- 向民貴(2020年5月19日)。〈瀘溪縣：微友反映廁所有問題 縣、鄉、村三級幹部給你解決〉。上網日期：2021年4月6日，取自新湖南，<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094028719530599&wfr=spider&for=pc>。
- Xiang Mingui (2020, May 19). Luxixian: Weiyou fanying cesuo you wenti, xian, xiang, cun sanji ganbu geini jiejie. *Xin Hunan*. Retrieved April 6, 2021, fro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094028719530599&wfr=spider&for=pc>.
- 向青平(2012)。〈新媒介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使用特點——以湘西永順縣為例〉。《新聞世界》，第12期，頁157-158。
- Xiang Qingping (2012). Xinmeijie zai shaoshu minzu diqu de shiyong tedian——Yi Xiangxi Yongshunxian weili. *Xinwen shijie*, 12, 157-158.
- 安東尼·吉登斯(1998)。《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上海：三聯書店。(原書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Andongni Jidengsi (1998). *Shehui de goucheng* (Li Kang, Li Meng, Tran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安東尼·唐斯(2006)。《官僚制內幕》(郭小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Downs, A.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Andongni Tangsi (2006). *Guanliao zhi neimu* (Guo Xiaco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owns, A.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成夢溪(2021)。〈近代縣域鄉紳群體的重構——以浙江省奉化為例的考察〉。《浙江社會科學》，第4期，頁139–145。
- Cheng Mengxi (2021). Jindai xianyu xiangshen qunti de chonggou——Yi Zhejiangsheng Fenghua weili de kaocha. *Zhejiang shehui kexue*, 4, 139–145.
- 朱春艷(2006)。《費恩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研究》。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
- Zhu Chunyan (2006). *Feienboge jishu pipan lilun yanjiu*. Shenyang: Dongbei daxue chubanshe.
- 朱健剛(1999)。〈國家、權力與街區空間——當代中國街區權力研究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2期，頁181–194。
- Zhu Jiangang (1999). Guojia, quanli yu jiequ kongjian——Dangdai Zhongguo jiequ quanli yanjiu daolun. *Zhongguo shehui kexue jikan*, 2, 181–194.
- 米歇爾·福柯(2021)。〈權力的眼睛〉(嚴鋒譯)。包亞明(編)，《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127–1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Foucault, M. [2001]. *Dits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 Mixieer Fuke (2021). Quanli de yanjing (Yan Feng, Trans.). In Bao Yaming (Ed.), *Quanli de yanjing——Fuke fangtanlu* (pp. 127–142).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oucault, M. [2001]. *Dits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 克利福德·吉爾茲(2000)。《地方性知識》(王海龍、張家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lifude Jierzi (2000). *Difangxing zhishi* (Wang Hailong, Zhang Jia,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吳寧(2007)。《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
- Wu Ning (2007). *Richang shenghuo pipan*.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杜贊奇(2003)。《文化、權力與國家》(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Duara, P.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Du Zanqi (2003). *Wenhua, quanli yu guojia* (Wang Fum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uara, P.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周天勇 (2008)。《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Zhou Tianyong (2008). *Zhongguo xingzheng tizhi gaige sanshinia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周雪光 (2011)。〈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第10期，頁67–85。
- Zhou Xueguang (2011). *Quanwei tizhi yu youxiao zhili: Dangdai Zhongguo guojia zhili de zhidu luoji. Kaifang shidai, 10, 67–85.*
- 周雪光 (2012)。〈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開放時代》，第9期，頁105–125。
- Zhou Xueguang (2012). *Yundongxing zhili jizhi: Zhongguo guojia zhili de zhidu luoji zai sikao. Kaifang shidai, 9, 105–125.*
- 周雪光 (2017)。《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北京：三聯書店。
- Zhou Xueguang (2017). *Zhongguo guojia zhili de zhidu luoji*.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周曉虹 (2002)。《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Zhou Xiaohong (2002). *Xifang shehuixue lishi yu tixi (di yi jua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房寧 (2021)。〈政治學為甚麼需要田野調查〉。《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0–16。
- Fang Ning (2021). *Zhengzhixue weishenme xuyao tianye diaocha.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1, 10–16.*
- 林尚立 (2016)。《論人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n Shangli (2016). *Lun renmin minzh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林尚立 (2016年3月9日)。〈上海基層治理有效嗎？〉。取自復旦發展研究院，<https://fddi.fudan.edu.cn/da/47/c19147a186951/page.htm>。
- Lin Shangli (2016, March 9). Shanghai jiceng zhili youxiao ma? *Fudan fazhan yanjiuyuan*. Retrieved March 21, 2022, from <https://fddi.fudan.edu.cn/da/47/c19147a186951/page.htm>.
- 俞可平 (2000)。《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u Keping (2000). *Zhili yu shanzh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俞可平 (2015)。〈政治傳播、政治溝通與民主治理〉。《現代傳播》，第9期，頁73–74。

- Yu Keping (2015). *Zhengzhi chuanbo, zhengzhi goutong yu minzhu zhili. Xiandai chuanbo*, 9, 73–74.
- 施蒂格·夏瓦 (2018)。《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劉君、李鑫、漆俊邑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Shidige Xiawa (2018). *Wenhua yu shehui de meijiehua* (Liu Jun, Li Xin, Qi Junyi,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查爾斯·蒂利 (2007)。《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0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0*.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Chaersi Dili (2007). *Qiangzhi, ziben he Ouzhou guojia (gongyuan 990–1990 nian)* (Wei Hongzh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0*.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紀程 (2006)。〈「國家政權建設」與中國鄉村政治變遷〉。《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75–80。
- Ji Cheng (2006). “Guojia zhengquan jianshe” yu Zhongguo xiangcun zhengzhi bianqian. *Shenzhe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1, 75–80.
- 苑鵬、白描 (2013)。〈福利視角下農民政治參與現狀的實證研究——基於山東、河南、陝西三省六縣487戶農戶的問卷分析〉。《理論探討》，第6期，頁13–16。
- Yuan Peng, Bai Miao (2013). Fuli shijiao xia nongmin zhengzhi canyu xianzhuang de shizheng yanjiu——Ji yu Shandong, Henan, Shanxi sansheng liuxian 487 hu nonghu de wenjuan fenxi. *Lilun tantao*, 6, 13–16.
- 唐士其 (1998)。《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Tang Shiqi (1998). *Guojia yu shehui de guanx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埃米爾·涂爾幹 (2013)。《社會分工論》(渠東譯)。上海：三聯書店。(原書 Durkheim, E. [1902].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London: Macmillian.)
- Aimier Tuerger (2013). *Shehui fengong lun* (Qu Dong, Tran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Durkheim, E. [1902].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London: Macmillian.)
- 夏學鑾 (2001)。〈從社區社會化到社會社區化〉。《社區》，第2期，頁29–3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Xia Xueluan (2001). Cong shequ shehuihua dao shehui shequhua. *Shequ*, 2, 29–30.
- 孫立平(1993)。〈改革前後中國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及民眾間互動關係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6期，第37–53頁。
- Sun Liping (1993). Gaige qianhou Zhongguo guojia, minjian tongzhi jingying ji minzhong jian hudong guanxi de yanbian. *Zhongguo shehui kexue jikan (xianggang)*, 6, 37–53.
- 孫立平(2000)。〈「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李強(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頁1–20)。廈門：鷺江出版社。
- Sun Liping (2000). “Guocheng—shijian fenxi” yu dangdai Zhongguo guojia—nongmin guanxi de shijian xingtai. In Li Qiang (Ed.), *Qinghua shehuixue pinglun teji* (pp. 1–20). Xiamen: Lujiang chubanshe.
- 孫立平(2002)。〈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頁83–96。
- Sun Liping (2002). Shijian shehuixue yu shichang zhuanxing guocheng fenxi. *Zhongguo shehui kexue*, 5, 83–96.
- 孫立平(2004)。〈轉型與斷裂〉。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Sun Liping (2004). *Zhuanxing yu duanlie*.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 孫信茹、王東林(2019)。〈玩四驅：網絡趣緣群體如何以「物」追憶——對一個迷你四驅車QQ群的民族誌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24–45。
- Sun Xinru, Wang Donglin (2019). Wan siqu: Wangluo quyuan qunti ruhe yi “wu” zhui yi——Dui yige mini siquche QQ qun de minzuzhi kaocha.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24–45.
- 祝基濤(1987)。〈政治溝通〉。《新聞學研究》，第38期，頁51–64。
- Zhu Jiying (1987). Zhengzhi goutong. *Xinwenxue yanjiu*, 38, 51–64.
- 秦暉(2003)。〈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中國鄉村研究》，第1期，頁1–31。
- Qin Hui (2003). Chuantong Zhonghua diguo de xiangcun jiceng kongzhi: Hantang jian de xiangcun zuzhi. *Zhongguo xiangcun yanjiu*, 1, 1–31.
- 馬丁·布伯(1986)。《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三聯書店。(原書Buber, M. [1983]. *Ich und Du*.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 Mading Bubo (1986). *Wo yu ni* (Chen Weigang,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Buber, M. [1983]. *Ich und Du*.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 馬克斯·韋伯(2010)。《經濟與社會》(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Weber, M. [1978]. *Economic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kesi Weibo (2010). *Jingji yu shehui* (Yan Kewe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eber, M. [1978]. *Economic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McLuhan, M. [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Maxieer Maikeluhan (2000). *Lijie meijie: Lun ren de yanshen*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McLuhan, M. [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高旺(2004)。〈農村青年在村級治理中的參與狀況分析〉。《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第6期，頁23–29。
- Gao Wang (2004). Nongcun qingnian zai cunji zhili zhong de canyu zhuangkuang fenxi. *Zhongguo qingnian zhengzhi xueyuan xuebao*, 6, 23–29.
- 常江、徐帥(2018)。〈伊萊休·卡茨：新媒體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媒介使用、政治參與和傳播研究的進路〉。《新聞界》，第9期，頁4–9。
- Chang Jiang, Xu Shuai (2018). Yilaixiu Kaci: Xinmeiti jiasu le zhengzhi de richanghua——Meijie shiyong, zhengzhi canyu he chuanbo yanjiu de jinlu. *Xinwen jie*, 9, 4–9.
- 張勁松、駱勇(2006)。〈論農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理論探討》，第5期，頁25–28。
- Zhang Jinsong, Luo Yong (2006). Lun nongcun cunmin zhengzhi lengmo de chengyin ji xiaojie. *Lilun tantao*, 5, 25–28.
- 張媛、文霄(2018)。〈微信中的民族意識呈現與認同構建：基於一個彝族微信群的考察〉。《國際新聞界》，第6期，頁122–137。
- Zhang Yuan, Wen Xiao (2018). Weixin zhong de minzu yishi chengxian yu rentong goujian: Jiyi yige Yizu Weixinqun de kaocha. *Guoji xinwenjie*, 6, 122–137.
- 張燕、邱澤奇(2009)。〈技術與組織關係的三個視角〉。《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200–215。
- Zhang Yan, Qiu Zeqi (2009). Jishu yu zuzhi guanxi de sange shijiao. *Shehuixue yanjiu*, 2, 200–215.
- 張靜(1998)。〈政治社會學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會學研究》，第3期，頁17–25。
- Zhang Jing (1998). Zhengzhi shehuixue ji qi zhuyao yanjiu fangxiang. *Shehuixue yanjiu*, 3, 17–2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張靜(2000)。《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Zhang Jing (2000). *Jiceng zhengquan—Xiangcun zhidu zhu wenti*.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 郭於華(2002)。〈「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讀書》，第7期，頁11–18。
- Guo Yuhua (2002). “Ruozhe de wuqi” yu “yincang de wenben”——Yanjiu nongmin fankang de diceng shijiao. *Dushu*, 7, 11–18.
- 郭亮(2013)。《地根政治：江鎮地權糾紛研究(1998–2010)》。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 Guo Liang (2013). *Digen zhengzhi: Jiangzhen diquan jiu fen yanjiu (1998–2010)*. Beijing: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郭星華、曲麒翰(2011)。〈糾紛金字塔的漏斗化——暴力犯罪問題的一個法社會學分析框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67–72。
- Guo Xinghua, Qu Qihan (2011). Jiufen jinzita de loudouhua——Baoli fanzui wenti de yige fa shehuixue fenxi kuangjia. *Guangxi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4, 67–72.
- 郭風英(2013)。〈「國家—社會」視野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研究〉。《社會主義研究》，第6期，頁70–75。
- Guo Fengying (2013). “Guojia—shehui” shiye zhong de shehui zhili tizhi chuanguangxin yanjiu. *Shehui zhuyi yanjiu*, 6, 70–75.
- 喻國明、馬慧(2016)。〈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範式：「關係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係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國際新聞界》，第10期，頁6–27。
- Yu Guoming, Ma Hui (2016). Hulianwang shidai de xin quanli fanshi: “Guanxi fuquan”—“Lianjie yiqie” changjing xia de shehui guanxi de chongzu yu quanli geju de bianqian. *Guoji xinwenjie*, 10, 6–27.
- 費孝通(2005)。《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
- Fei Xiaotong (2005). *Xiangtu Zhongguo*.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賀雪峰(2011)。〈論鄉村治理內卷化——以河南省K鎮調查為例〉。《開放時代》，第2期，頁86–101。
- He Xuefeng (2011). Lun xiangcun zhili neijuanhua——Yi Henansheng K Zhen diaocha weili. *Kaifang shidai*, 2, 86–101.
- 賀雪峰(2013)。《新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He Xuefeng (2013). *Xin xiangtu Zhongguo*.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賀雪峰、劉岳 (2010)。〈基層治理中的「不出事邏輯」〉。《學術研究》，第6期，頁32-37。
- He Xuefeng, Liu Yue (2010). Jiceng zhili zhong de “bu chushi luoji”. *Xueshu yanjiu*, 6, 32-37.
- 黃宗智 (2003)。〈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中國鄉村研究》，第2期，頁66-95。
- Huang Zongzhi (2003). Zhongguo geming zhong de nongcun jieji douzheng——Cong Tugai dao Wenge shiqi de biaodaxing xianshi yu keguanxing xianshi. *Zhongguo xiangcun yanjiu*, 2, 66-95.
- 葉媛秀、古小明 (2009)。〈政治社會學視野中的村民素養與村民政治參與關係略論〉。《求實》，第11期，頁91-94。
- Ye Yuanxiu, Gu Xiaoming (2009). Zhengzhi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cunmin suyang yu cunmin zhengzhi canyu guanxi luelun. *Qiushi*, 11, 91-94.
- 雷吉斯·德布雷 (2014)。《普通媒介學教程》(陳衛星、王楊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Debray, R. [1991].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 Leijisi Debulei (2014). *Putong meijiexue jiaocheng* (Chen Weixing, Wang Yang, Tran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ebray, R. [1991].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 趙世瑜、鄧慶平 (2001)。〈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第6期，頁157-172。
- Zhao Shiyu, Deng Qingping (2001). Ershi shiji Zhongguo shehuishi yanjiu de huigu yu sikao. *Lishi yanjiu*, 6, 157-172.
- 趙旭東 (2017)。〈微信民族誌時代即將來臨——人類學家對於文化轉型的覺悟〉。《探索與爭鳴》，第5期，頁4-14。
- Zhao Xudong (2017). Weixin minzuzhi shidai jijiang lailin——Renleixuejia duiyu wenhua zhuanxing de juewu. *Tansuo yu zhengming*, 5, 4-14.
- 趙晉泰 (2007)。〈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冷漠現象分析〉。《理論探索》，第1期，頁134-135。
- Zhao Jintai (2007). Cunmin zizhi zhong de zhengzhi lengmo xianxiang fenxi. *Lilun tansuo*, 1, 134-135.
- 歐陽靜 (2014)。〈論基層運動型治理——兼與周雪光等商榷〉。《開放時代》，第6期，頁180-190。
- Ouyang Jing (2014). Lun jiceng yundongxing zhili——Jian yu Zhou Xueguang deng shangque. *Kaifang shidai*, 6, 180-19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 鄧正來、景躍進(1992)。〈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創刊號，第58–68頁。
- Deng Zhenglai, Jing Yuejin (1992). *Jianguo Zhongguo de shimin shehui. Zhongguo shehui kexue jikan (xianggang), Chuangkanhao*, 58–68.
- 鄭永年(2014)。《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邱道隆譯)。北京：東方出版社。(原書Zheng, Y. N.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ongnian (2014). *Jishu fuquan: Zhongguo de hulianwang, guojia yu shehui* (Qiu Daolong, Trans.).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Zheng, Y. N.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戴利朝(2011)。《農村的基層政權建設》。南京：江蘇大學出版社。
- Dai Lizhao (2011). *Nongcun de jiceng zhengquan jianshe*. Nanjing: Jiangsu daxue chubanshe.
- 戴維·伊斯頓(1989)。《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Easton, D.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Daiwei Yisidun (1989). *Zhengzhi shenghuo de xitong fenxi* (Wang Puqu,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Easton, D.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謝暉(2004)。〈當代中國的鄉民社會、鄉規民約及其遭遇〉。《東岳論叢》，第4期，頁8。
- Xie Hui (2004). *Dangdai Zhongguo de xiangmin shehui, xianggui minyue ji qi zaoyu. Dongyue luncong*, 4, 8.
- 顏珂(2018年8月19日)。〈湖南省湘西州活躍著1843個村級權力監督微信群〉。《人民日報》，第11版。
- Yan Ke (2018, August 19). *Hunansheng Xiangxizhou huoyue zhe 1843 ge cunji quanli jiandu Weixinqun. People's Daily*, pp. 11.
- 羅伯特·達爾(2006)。《民主及其批評者》(曹海軍、佟德志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原書Dahl, R.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uobote Daer (2006). *Minzhu ji qi piping zhe* (Cao Haijun, & Tong Dezhi, Trans.). Changchun: Jilin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ahl, R.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

羅德·黑格、馬丁·哈羅普(2007)。《比較政治與政府導論》(張小勁、丁韶彬、李姿姿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Hague, R., & Harrop, M. [2001].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Luode Heige, Mading Haluopu. (2007). *Bijiao zhengzhi yu zhengfu daolun* (Zhang Xiaojin, Ding Shaobin, Li Zizi,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gue, R., & Harrop, M. [2001].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Aristotle (1962). *The politics* (T. Sinclair, Trans.). Penguin Books.

Deutsch, K. W. (1963).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Hine, C. M.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Sage.

Lewis, J. M. (2011). The future of network governance research: Strength in diversity and synthe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89(4), 1221–1234.

Oi, J.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lato. (1974). *The republic* (H. D. P. Lee, Trans.). Penguin Books.

Rankin, M. B. (1993).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Modern China*, 19(2), 158–182.

Siu, H. F.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outs, M. C. (1998). 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155), 81–89.

Srader, D. W. (2015). Performative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29(2), 95–102.

本文引用格式

向青平(2023)。〈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湘西村級微信群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溝通過程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4期，頁161–20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附錄

1. 村民XYM。XYM，1965年生，女，小學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家務農，孫女兒上學的時候陪讀在縣城。
2. 村民SQ。1975年生，男，小學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過去在外務工，現在在家務農，在微信群發言較多，與村主任有過爭執。
3. 村民GE，1965年生，女，小學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外務工。
4. 村民GXA，1959年生，男，小學畢業。享受扶貧政策，在外務工，與GE為兄妹。
5. 村民XE，1955年生，小學未畢業。享受扶貧政策，殘疾。腿腳不方便，在村務農、做小生意。
6. 村民CF，1953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日雜百貨店老闆。
7. 村民XB，1986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享受扶貧政策，父親早年去世，在外常年務工。
8. 村民XJY，1935年生，男，未讀過書。但自學識字、讀寫詩詞，享受扶貧政策，後其低保被取消，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孫女和村主任的衝突。
9. 村民HSB，1950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久病不去醫院，患有胃癌。
10. 村民HY，1982年生，男，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獲徵地補償款，在外做生意。
11. 村民YZ，1942年生，男，初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留守老人，與XJY為朋友。
12. 村民ZDP，1994年生，女，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在省會城市餐館裡從事服務員，在微信群中較為沉默。
13. 村民WXJ，1985年生，女，高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常德自主創業，也會在微信群中進行公共政策諮詢。
14. 村民SJ，1989年生，大專水平。享受扶貧政策，在家賦閑，偶爾在城鄉開車接送人，曾是村小組組長。

場景、關係與治理變革

15. 村民WXH，1996年生，高中文化水平。未享受扶貧政策，在家務農，是村中的水泥工，姐姐已嫁人。
16. 村民SZL，1943年生，未讀小學。是城市工地的建築工，地點不固定，沒有工作的時候在家務農，未享受過扶貧政策。
17. 村民ZZ，1946年生，女，未讀過書。她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去世，一個兒子在村中游手好閑，享受扶貧政策。
18. 村民PYK，1951年生，男，高中未畢業。享受扶貧政策，在家務農，偶爾和村民SZL一起出門務工。
19. 村民WG，1941年生，女，未讀過書。70歲改嫁，平時做小生意、務農生活，享受過扶貧政策。
20. 村民HEL，1992年生，男，高中未畢業。未享受扶貧政策，高中期間專職從事遊戲直播，後因父母原因在外務工。